

爭取日文讀者大眾：黃得時及「新銳中篇創作集」^{*}

陳淑容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文以《臺灣新民報》學藝欄主編黃得時策劃的「新銳中篇創作集」（1939.7.6-1940.5.14）為中心，探究黃得時如何透過日文通俗小說尋求共鳴，爭取讀者大眾。本文通過「同盟通信社」的組織運作與報紙漢文欄廢止政策探討戰爭前後日台政治形勢的轉化與新聞統制措施，檢視時局影響下，主編黃得時的編輯策略。本文指出，通過該特輯的討論，有助我們釐清1930年代末期台灣日文讀者大眾的形成狀況，也能更進一步理解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的內涵及其文化意義的轉化。

台灣文學史的1937至1940年，因為戰爭影響導致報紙漢文欄廢止以及純文學雜誌停擺，而被當時文學者賦予「空白」、「冬眠」、「黑夜」與「寂寥」等意象。本文經由報紙學藝欄的梳理以複雜化對此階段的詮釋，彰顯戰爭時期台灣文學的多元面貌。。

關鍵詞：殖民主義、戰爭文學、文學史、大眾、黃得時、中篇小說

* 本論文首先由星名宏修翻譯刊載於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会》第7號（2013.03），修改後投稿《台灣文學研究學報》。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出許多深具啟發性的建議，本文在能力範圍內進行修正，謹致謝忱。

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Reading Public: Huang Deshi and “Collection of New Wave Novellas”

Chen Shu-Ju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ewspaper *Taiwan Shin Minpou*'s literary column in war-time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 exploring how Taiwanese writers who wrote in Japanese after Chinese was banned to appear in newspapers used this space to speak up and to make dialogues with a reading public in the making.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organizing of Domei Tsushinsha as well as Japan-Taiwan'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ing policy regarding journalism. *Taiwan Shin Minpo*'s “collection of new-wave novellas,” edited by Huang Deshi, is closely scrutinized about Huang's edit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how these novellas helped to create new readership and to mobilize a movement which was to make transition to another literary high point at a later tim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is “collection of new-wave novellas” created an imagery space for both elite and popular readers. This imagery space made possible by the editor, the novelists, and the painters re-energized colonial Taiwan's literary circles temporarily deactivated due to the eruption of the war.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se original and artistic creations in a time of what Huang Deshi had called “literary blankness” or Long Ying-zong had called “the darkness of literature” in order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omplexities of wartime literature in colonial Taiwan.

Keywords: Colonialism, Wartime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Public, Huang Deshi, Novellas

爭取日文讀者大眾：黃得時及「新銳中篇創作集」

一、前言

1937年7月7日，發生在中國北平郊外蘆溝橋的軍事衝突，引發了往後八年日本與中國戰爭的導火線。此一事件不但在第一時間衝擊島內政治，也改寫既有的文壇生態。1938年及1月以後，就有黃得時、柳川浪花及龍瑛宗等文學者，分別用「冬眠」、「寂寥」及「文學之夜」等字眼以比喻事件後低迷的台灣文學界。¹

當時擔任《臺灣新民報》（以下簡稱《新民報》，引文照舊）學藝欄²編輯的黃得時在後來的〈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一文指出，支那事件發生後到1940年1月1日「臺灣文藝家協會」成立後的這段期間，除了「《臺灣新民報》上新銳中篇小說的企劃之外，沒有文學活動亦沒有文藝雜誌。這兩年半時間可以說是台灣文學運動的一個空白時代。」黃得時歸納「空白時代」的成因，包括（一）直接面對支那事變此等國家的大事件，眾人失去了心裡的從容不迫和鎮靜。（二）向來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本島人作家，做為軍屬或通譯前往大陸。（三）受到自由主義或普羅文學洗禮的作家沒法充分發表意見。³

1 黃得時，〈冬眠を食ふな，臺灣の作家達よ〉，《臺灣新民報》，1938.01.01，11版。柳川浪花，〈淋しき昭和十二年の本島文藝界〉《臺灣公論》3卷1號（1938.01）。引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学文芸評論集（三）》（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04），頁164-165。龍瑛宗，〈文學の夜〉，《臺灣新民報》1939.01.01，13版。

2 「學藝欄」類似今天的報紙副刊，或稱為「文藝欄」，為刊登文學、藝術與學術作品及消息的版面，本文論述時候一律使用「學藝欄」這個歷史名詞，引文則照舊。在1937-40年間，固定刊有學藝欄的四大日刊報紙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報》（原《台南新報》）、《臺灣新聞》及《臺灣新民報》，各報學藝欄因編輯風格與策略的不同，而在版面配置、美編風格與刊載內容上呈現極大的差異。

3 黃得時，〈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2卷4號（1942.10），頁6-7。引自葉石濤譯，〈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394。

黃得時及龍瑛宗提出的「冬眠」、「文學之夜」等意象容易讓人偏廢一方，導致長久以來此一時期常被冠以台灣文學史上的「空白時代」這樣的稱號。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忽略這些字眼背後同時隱含了「蟄伏後再起」以及「黎明前的黑暗」等另一種積極意涵的可能。

對此近來河原功、陳淑容及張文薰等人藉由深化論述文壇與戰爭的多重關係，試圖反轉上述的刻板印象，企圖提出台灣文學史的另一種解釋可能。⁴ 比如張文薰在〈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一文指出，文學場域的重整以及本島與內地人作家選擇書寫題材的趨近，這兩個具備文學史重要意義的現象使得意味著活動停止或內容貧乏的「空白期」界定受到挑戰，1937年7月以後反而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活動的轉捩點。⁵

相較於張文薰論文側重分析台灣民俗題材、歷史敘事性故事於在台日人小說中大量出現的歷史意義，本文關注文學場域的重整。認為若能將戰爭前後的新聞統制、漢文欄廢止等現象納入考量，當能更結構性地看待此一階段。亦即，面對這個被時人稱之為文學活動與文藝雜誌的「空白的時代」，本文將以四大日刊報紙之一的《新民報》學藝欄為中心，考察編輯黃得時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透過日文學藝欄重組台灣文學場域，以爭取讀者大眾。

二、「新銳中篇創作集」的登場

黃得時的〈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一文固然為1937至40年本島的文學活動下了「空白的時代」之註腳，但他也不忘提出，因為戰事的進展，眾人逐漸恢復從事文學之心，特別是滿洲和朝鮮文壇的刺激，更使得上述狀況出現

4 相關論著如河原功作，松尾直太譯，〈1937年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學狀況——圍繞著廢止漢文欄與禁止中文創作的諸問題〉，收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編，《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06）。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1940）〉（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2012.04）。

5 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頁107。張文薰的論文為在台日人文藝活動做出解釋，本論文則側重勾勒台灣人的文藝樣態。

轉機。⁶而他所謂「暫時萎縮中的文學熱情再度昂揚」的關鍵點，就是1939年《新民報》推出的新銳中篇小說特輯。⁷考察該特輯的企劃、宣傳、發表與流通等形式當有助我們釐清其重要性與意義。

在黃得時策劃下，《新民報》學藝欄從1939年7月6日起到1940年5月14日止，刊出「新銳中篇創作集」，登載包括翁鬧〈有港口的街市〉、王昶雄〈淡水河的漣漪〉、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呂赫若〈季節圖鑑〉以及張文環〈山茶花〉五部中篇小說，這是前後長達242回的專輯連載。也就是說，扣除中間約末二個月的空檔，一年裡頭將近三分之二的時間，該特輯持續且密集地在日刊報紙《新民報》現身。⁸

特輯刊出前的學藝欄預告如此寫著：「執筆者皆為本島文藝界第一線活躍之人物，齊聚一堂，各自攜其傑作，相繼於本報登場。這是本島文藝界未曾有過的快舉，相信必是劃時代的事蹟，望讀者各位喜愛。」⁹這則顯然是由黃得時執筆的刊前預告，除了重申「文學之夜」的沉潛及能動性之外，並賦予「新銳中篇創作集」於文運由夜轉明過程中擔任重要推手之使命。

預定刊出的陳華培〈蝴蝶蘭〉後來並未登出，後來實際撰寫的五位作家皆有文名，翁鬧、龍瑛宗、呂赫若與張文環更是稍早獲得中央文壇獎項肯定的台灣人作家。小說推出前的固定模式是包括作者之言、畫者之言及其相片，並搭配畫家插繪的刊前預告。這個一方面移植日本內地新聞小說的連載公式，一方面也有所承接前此《新民報》漢文通俗連載小說的行銷手法，藉由預告以及作

6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394。

7 關於戰爭與文壇，可見柳書琴的先行研究，〈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8 「新銳中篇創作集」包括翁鬧作，榎本真砂夫畫，〈有港口的街市〉（港のある町）（1939.07.06-8.20，46回）；王昶雄作，中村敬輝畫，〈淡水河的漣漪〉（淡水河の漣）（1939.08.21-09.22，33回）；龍瑛宗作，陳春德畫，〈趙夫人的戲畫〉（「趙夫人」の戲畫）（1939.09.23-10.15，22回）；呂赫若作，一木夏畫，〈季節圖鑑〉（1939.10.16-11.15，30回）與張文環作，陳春德畫，〈山茶花〉（1940.01.23-05.14，111回）五部中篇。之後，《新民報》又陸續刊出另外包括中山ち系〈水鬼〉（1940.08.01-08.10，10回）、陳垂映〈鳳凰花〉（1940.08.24-09.06，14回）及舟津敏之〈梔子抄〉（1940.09.12-09.23，12回）三篇在形式上略有所同，但篇幅明顯縮小，並省略刊前廣告、「作者言」與「畫者言」等特輯重要組成部分的小說，我將他們稱為「新銳中篇集外集」。

9 分別在1939年6月29日及7月2日的《臺灣新民報》刊出，是占了學藝版面重要位置的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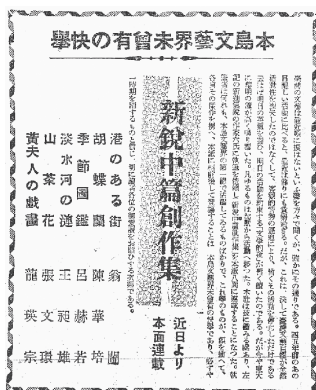


圖1 「新銳中篇創作集」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39年6月29日。



圖2 翁鬧小說〈有港口的街市〉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39年7月4日。



圖3 王昶雄小說〈淡水河的漣漪〉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39年8月19日。



圖4 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39年9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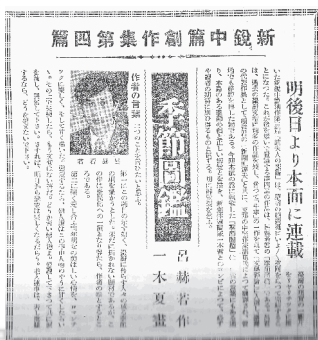


圖5 呂赫若，〈季節圖鑑〉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39年10月14日。



圖6 張文環，〈山茶花〉之刊出預告。《臺灣新日報》1940年1月11日。

者的現聲／現身說法以吸引讀者目光。¹⁰

作為報紙購讀的主要消費社群，讀者的多寡攸關報社經營，因而在近代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大眾傳播媒體脈絡中，訂戶是被慎重以待的。為了爭奪非特定的大眾閱讀者群，作者、畫者以及編輯亦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進行文稿、畫稿與編稿的搭配。這是一項與時間競爭的工作，考驗著彼此的默契以及配合度，其傳播形式與文學雜誌有極大差異，將一群未知的日文大眾閱讀者群納入文本消

10 陳偉智著，星名宏修譯，〈患つた時代の病——雞籠生とその周辺〉針對為《新報》漢文連載小說進行插繪的雞籠生作品及其時代特徵做了細緻考察，而星名宏修為之撰寫的解說〈「讀者大眾」とは誰のことか？〉亦值得參考。收於松浦恆雄、垂水千惠、廖炳惠、黃英哲等編，《越境するテキスト——東アジア文化・文学の新しい試み》（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08.08），頁162-207。

費市場予以考量，更是其特色。

這個齊聚了「本島文藝界第一線活躍之人物」的特輯，於是透過新聞小說的連載方式，傳遞故事。在日文全面取代漢文的時刻，編者黃得時和作家群採取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言說策略，他們跳脫「純文學」、「菁英小眾」，訴求「封閉」、「特定」讀者群的同人雜誌之傳播模式，嘗試尋求一個以「通俗文學」、「庶民大眾」等「開放」、「非特定」讀者群為對象的報紙傳播方式。企圖通過「中篇小說」取代當時報紙學藝欄主流文類——新詩、隨筆與評論，強調以本地作家的創作取代既成的同盟通信社之供稿，更見編輯黃得時的苦心。

特別一提的是，此一在地化的文藝生產姿態無疑是此特輯所以引人注目之處：作者與畫者共同構築的文字／圖像文本，經由日刊報紙的連載敘事，營造出雅俗共賞的想像空間，由此得以進入讀者的日常生活世界。這個開創性的文學生產脈絡啟動一個新的可能，振奮了事變後低迷的台灣文學活動。

三、同盟通信社：戰時期的國策宣傳與新聞生產機構

「新銳中篇創作集」之所以在1939年中登場有其歷史與政治背景。在日本，對內因為1931年滿洲事件的發生，使得右翼軍國主義逐漸抬頭，政治勢力朝向法西斯一面倒的結果，啟動日後對中侵略的「十五年戰爭」。對外則於1933年8月脫離國際聯盟、1936年初退出倫敦軍縮會議，與美、蘇關係日益緊張，遂通過1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協定，以避免日漸孤立的國際關係。¹¹

擴張的欲望以及日漸激化的國際關係加深其危機感，伴隨之的是日本國內陸續發生的大規模恐共整肅，其中又以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遭虐殺，以及隨之引發的日共成員集體「轉向」的風潮最引人注目。¹² 內外交迫的困境，使得自大正時代以來的多元異質聲響逐漸被消音。來自日本國內的政經局勢很快影響了殖民地台灣，使得各個政治、社會運動以及思想團體陷入不振的狀態，

11 狩野信行，《檢証大東亜戦争史（上巻）》（日本東京：芙蓉書房，2005.06），頁86。

12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01）。

以往合法的表面運動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下活動的形式。

這些現象更尖銳地呈現在1936年9月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就任第17任台灣總督一事。小林總督的就任宣告自田健治郎以降連續17年文官總督時代的終結，更是日本國內緊繃政情的直接反應。滿洲事變以來日中兩國的緊張關係，直接壓迫著殖民地台灣的統治政策，並隨著之後蘆溝橋事件的發生而加劇。春山明哲觀察到，為了因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帝國日本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將台灣視為「南進據點」，如何有效動員殖民地人力資源，使其對殖民母國效忠，成了首要之務。為了使台灣人對彼岸的中國（民族的）斷念並效忠日本帝國（國家的），小林躋造於是大力推動了極端同化主義，亦即俗稱「皇民化運動」的「皇國民精神強化運動」。¹³

皇民化運動的具體內容包括總督府一邊呼應日本國內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下達各地方長官「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相關要件；一方面強化對民眾的宣傳與動員，並陸續針對台灣人實施包括宗教與社會的改革（寺廟整理）、國語運動（報紙漢文欄「廢止」、台灣語使用限制）、改姓名以及志願兵制度等措施，以貫徹皇國臣民之道為要務。¹⁴

這些外在條件限制了台灣文學的發展。特別是隨著1937年4月以後四大報社共同宣布漢文欄「廢止」的緊縮措施，使得原本險惡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報紙編輯除了要面對日益險惡的時局，更要設法從被揀選過的「同盟通信社」供稿中突破重圍。以下將探討「同盟通信社」的組織運作以及「漢文欄廢止」這兩個左右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事項。

1936年1月成立的「同盟通信社」（簡稱「同盟」）是由國家力量主導，統合「新聞聯合社」與「日本電報通信社」二大通信社而成立的組織，創設初始的「同盟」其目標設定為新聞的「發信」與「受信」。隨著隔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及其後戰時體制的擴張，「對外宣傳」、「對敵情資料秘密接收」、「協助佔領地當地駐軍」等三大主軸很快成為其主要訴求。之後，因應戰事發

13 春山明哲，〈解說——日中戦争期の台湾民衆の「素顔」〉，春山明哲編，《台灣島内情報・本島人の動向》（日本東京：不二出版，1990.02），頁3-8。

14 同註13，頁3-8。

展而迅速擴張的同盟，社長古野伊之助更以「報導報國」、「正確迅速」、「大同團結」等三原則，提示其成員「朝著貫徹國策邁進」。從事件前夕到1945年10月隨著日本帝國敗戰而後解體的這段約九年時間中，「同盟」的任務都與戰爭息息相關，因而獲致「戰時期負擔帝國宣傳活動的國策通信社」的普遍評價。¹⁵

立基國策需要而成立的「同盟」對帝國的新聞統制產生莫大助益，統一的供稿也為各大報節省了一定的成本。但當新聞充斥御用議論，意味著新聞為正義發聲，為真理而批判的理想已淪喪，連帶也限制了全體社會的反省與進步。「同盟」主導下的新聞一統壓縮了地方報的異質性，扼止其生存空間，隨之而來的是地方小報的經營以及記者生計受到嚴重影響。1936年以後，伴隨著同盟通信社的成立而出現的普遍現象是地方報倒閉以及記者失業潮的湧現。¹⁶

戰時體制下為協力國策，關係著情感交流與思想傳遞的文學與藝術，當然被納入思想戰的重要環節。「同盟」的文藝通信附屬於特別通信部（特信部）之下，特信部所負責的業務包括時事問題解說、特殊讀物、學藝、婦人家庭、科學、兒童以及漫畫等主題。針對相關議題，「同盟」設計了ABC三種版本，其社員固然可經過自由選取，透過不同的排列組合呈現各個報紙版面的差異，但固定的「同盟」稿源畢竟使其整體內容大同小異。¹⁷

在台灣，以《臺灣日日新報》為首的五家日刊報紙，包括《新民報》、《臺灣新聞》、《台南新報》（後改稱《臺灣日報》）、《東臺灣新報》，於同盟通信社甫創設的1936年初，就加入成為社員，而在報紙的學藝版面大量使用了同盟的供稿。¹⁸

事變後，圍繞著戰爭與文學的專題屢被推出，戰爭與文學者、戰爭與文

15 內川芳美，〈日本ファシズム形成期のマス・メディア統制（一）〉，《思想》（1961年7月號）。轉引自里見脩，〈同盟通信社の「戰時報道体制」——戰時期における通信系メディアと国家〉，山本武利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四卷——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6.03），頁172。

16 大村克人，〈新聞通信統制とその他〉，《新聞と社會》7卷7號（1936.07），頁14-15。

17 同盟通信社編印，〈同盟の組織と活動〉（日本東京：同盟通信社，1941.07），頁48。

18 同盟通信社編印，〈同盟通信社の機構〉（日本東京：同盟通信社，1941.11），頁48。

壇、時局與新聞、從軍筆部隊等都是常見議題；與戰事推進息息相關的大陸文學、農民文學、生產文學、航空文學、海洋文學等亦時有所見。另外，為前進大陸所做的「支那」文壇與作家介紹，時局下以「國語」及「北京語」等語言、文學、文化為中心的專題不斷出現在同盟的供稿行列。

經由選取過濾後的「同盟」文藝新聞的大量放送，戰爭文學與國民精神等議題在無形中滲透進入讀者的思維。這些在國策宣揚與不當新聞抑止的天平間取得巧妙平衡的同盟供稿，除了達成翼贊戰爭文學與國民精神的目標，更在無形中箝制了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與日常生活，新聞作為社會木鐸的理想漸次淪喪。

四、「漢文欄廢止」：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變奏

在「同盟」強力運作的一年後，台灣四大報紙發佈了廢止報紙漢文欄的聲明。這則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報》、《臺灣新聞》與《新民報》共同於1937年3月1日發佈的聲明指出：基於時勢發展考量，四大報社協商共同廢止漢文欄。相信即便現在全廢漢文欄，也不至於會對領台已達四十餘年，皇化廣泛普及，文運遽然興起中的本地台灣造成任何障礙。¹⁹

早在日本領台之初的明治時代，為了配合台灣總督府向台灣人社會傳達政令的政策思考，以及面對絕大多數不聞日文的台灣人市場之營利需求，幾家日資報社早就設置了供台灣人讀者閱讀的「漢文欄」。李承機在〈殖民地台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一文中即指出，報紙漢文欄的意義在於「被台灣人當作書寫語言的漢文第一次被使用到台灣發行的媒體之上」。漢文在此時作為一種出版語言，其目的是為了翻譯總督府的日文重要命令，以對台灣人進行政令及政策宣達，因而擁有如地方保正等固定購讀者；加上涉及攸關業績的漢人讀者群之娛樂與教化事項攸關業績，因

19 〈漢文欄の廢止に就いて島内四日刊紙の申合〉，《臺灣日日新報》，1937.03.01，3版。

此帶有強烈的「御用性」與「營利性」。²⁰

到了1920年代以後，由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台灣青年》，開始了台灣人開創的媒體出現之契機。由於開創者多為具備漢／日文讀寫雙語能力的知識分子，《台灣青年》因此採用了「漢／日文並刊」的方式。相較於日資新聞漢文欄具備的「御用性」與「營利性」，《台灣青年》及其後續刊誌則標榜漢文所代表的「民族性」與「現代性」，他們與台灣文化協會相互呼應，透過言論發聲與文藝論述，形塑192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和文化運動的重要力量。

《台灣青年》歷經《臺灣》、《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的多次改題，發刊型態從月刊、半月刊、旬刊而週刊，12年間不斷與總督府體制衝撞協調後，終於在1932年4月15日發行了日刊《臺灣新民報》。值得一提的是，創刊以來，該報漢文學藝欄除了提供漢文作家的重要發表園地，更是中國、日本及歐美文學仲介與文學議題衍生及討論的主要場域。幾場重要的文學論戰，比如1920年代中葉的新舊文學論戰以及1930年代初期的鄉土文學論戰，都是透過此一文學場域，進行理論交鋒與創作實踐。²¹

表面看來，漢文欄廢止是四大報社自由意志下產生的共識，但中島利郎從1937年1月15日府令「公學校漢文廢止」等一連串相關事件提醒我們，總督府與報社主管協商的行動扮演主導該起事件的重要角色。河原功進一步指出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之事早在1936年7月25日的「民風作興協議會」上即被決定，但因為總督府方面刻意強調「希望廢止報紙漢文欄不採取法律手段來實現」，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四大日刊報的聯合公告，而非總督府透過法律或律令來

20 李承機，〈殖民地台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2004.04），頁202；〈從清治到日治時期的「紙虎」變遷史：將緊張關係訴諸「輿論大眾」的社會文化史〉，柳書琴、邱貴芬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04），頁25。

21 林淇濱，《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0），頁25-29。李承機，〈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苦悶』——日刊・台灣新民報創始初期史料解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出版，《日刊台灣新民報創始初期電子書》（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07）。

推動，這事件因此在表面上呈現了「自動廢止」的結果。²²

針對漢文欄廢止一事，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更直言：「依據這次本島有力新聞紙的聯合聲明，廢止原本占版面四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的漢文欄，確切地說是臺灣語欄，讓使用內地語言、文章之報導得以擴張。……因此歷任當局雖為普及國語教育而努力，以徹底宣揚皇國精神。但現實上為了考慮讀者的方便，當局至今尚未在新聞上全面廢止臺灣語、臺灣文。實際上大家對於早晚廢止漢文欄都沒有異議。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而已。」²³ 小林將「漢文欄」等同於「臺灣語」、「臺灣文」，在他定義下的「漢文欄」，是對立於「國語」，並且有礙「皇國精神」宣揚的存在。

前述1931年9月滿州事變爆發之後，隨著軍部力量擴增，急欲藉由「非常時期」的名目確立戰時體制，啟動了對高舉反戰的文化、文學運動之鎮壓的時代。被小林總督視為等同於「臺灣語／文」的「漢文」欄之存在，不但有礙皇國精神的推進，更切斷了內地語言全面進入台灣人生活與思維的可能，在引發總督府危懼的同時亦不可免地走上被廢止的命運。²⁴ 報紙漢文欄廢止意味著原本存在相當數量的漢文書寫／閱讀者群被迫中斷了通過該欄進行的交流與互動，首當其衝的是原本活躍於學藝欄的漢文作家被迫輟筆，同時既有的漢文讀者群也必需重建新的文藝閱讀模式。詩人兼史家楊雲萍，在1940年為《臺灣小說選》寫的序言，就指出漢文欄的廢止乃台灣新文學運動「告了一個大段落」：

-
- 22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研究の問題点——台灣總督府による漢文禁止と日本統治末期の台灣語禁止を例して〉，《岐阜聖徳学園大学外国語学部中国語学科紀要》第5号（2002.03）。河原功作，松尾直太譯，〈1937年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學狀況——圍繞著廢止漢文欄與禁止中文創作的諸問題〉，《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3 小林躋造，〈漢文欄廢止に關する小林總督の聲明〉，原刊《臺灣時報》210號（1937.05），引自臺灣總督府，《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台北：臺灣總督府，1941），頁768-769。
- 24 陳培豐在他系列的研究中，指出在東亞漢文文化圈之下，一個既「是」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日文的混雜體，又「非」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日文的「殖民地漢文」這種恣意性、混雜性極高的文體概念之形成，使得統治者無法進入台灣人獨特的文脈，引發殖民者的危懼也導致其被禁止的命運，可供參考。陳培豐，〈識字・閱讀・創作和認同——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頁83-111；陳培豐，〈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台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台灣史研究》18卷4期（2011.12），頁109-164。亦見陳培豐，《想像和界線：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

到這裡，我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方才得了些少的結果，告了小段落……。

一直到昭和12年6月的各報「漢文欄」的所謂廢止，才嚴肅地，告了一個大段落。²⁵

面對漢文欄廢止此一重大的文化政治轉折，各報不約而同採取了擴充日文學藝欄的措施。松尾直太就觀察到由《台南新報》改稱的《臺灣日報》在漢文欄廢止後的政策轉變，進而指出：「『學藝欄』的誕生，是因台灣島內日刊報社共同商定廢止漢文欄而緊跟著採取『擴充日文欄』的措施而來……。」²⁶那麼，本文所關注的《新民報》，其社方與編輯又將採取何種因應策略呢？

五、朝向日文中心：編輯黃得時的攻守策略

如前所述，對夙有「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新民報》而言，1937年無疑是嚴竣難熬的時候。外有同盟通信社的積極運作，《新民報》通過同盟接受了過濾式的新聞，學藝欄更是因為大量使用同盟供稿飽受批評。另一方面，隨著各報社於1937年3月聯合宣佈漢文欄廢止，在報社稿源嚴重短缺的情形下，使用同盟稿件的惡性循環日益嚴重。²⁷

漢／日文欄的廢與立，更是對主事者的一大考驗。面對這樣的局勢，報社方面除了擴充日文學藝欄，更進一步以更換學藝欄編輯因應。1937年3月，剛從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畢業的黃得時，隨即於該月接任徐坤泉職

25 楊雲萍，〈序〉，李獻璋編，《臺灣小說選》（未出版，1940.01）。附帶一提，這本收錄重要漢文小說的集子，因無法通過總督府檢閱制度而未能正式刊行。

26 松尾直太，〈《台灣日報》「學藝欄」及其主編岸東人〉，《台灣文學學報》8期（2006.06），頁71。

27 審查者提出同盟通信社供稿對各大報紙場域的影響應是平等的，提醒筆者關注其他報紙狀況。本文特別著重《新民報》部分，是考量漢文欄廢止為《新民報》帶來的稿源缺乏問題勢必較他報嚴重，對同盟的依賴程度也會較深，連帶導致該報更換學藝欄編輯以為因應。相較之下，受到語文轉換衝擊不若《新民報》深遠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與《臺灣日報》等三大日資報紙學藝欄，則維持由西川滿、田中保男與岸東人擔任編輯的狀態。

務，擔任學藝欄編輯。²⁸

在未見1937年《新民報》的前提下，作家吳漫沙以「最後一頁」為名的剪貼簿為漢文欄廢止留下了珍貴的見證。他說：「『最後一頁』之為名，就是這個意思，藉作紀念夭殤之新民報漢文學藝欄……。²⁹」原編輯老徐（徐坤泉）在〈最後一課〉以園丁自居，感嘆「園丁無才、地主無能」，致使南國園地將要賣渡於他人之手。新繼者黃得時在〈最後一句〉中撫今追昔，肯定《新民報》漢文學藝欄在台灣文學史的歷史地位。但他更不忘強調：

聽說本學藝面閉幕之後，和文學藝面，欲擴張篇幅登場。那麼吾們無論是作者、或是讀者，均要如向來愛顧漢文一樣，來愛顧和文。因為今後的臺灣，一切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以和文為中心。這乃是時勢使然的，非人力之所能推挽。

相較於吳漫沙及徐坤泉沉湎於《新民報》漢文學欄榮光，傷感其夭折；剛從台北帝國大學畢業，專攻日本和中國文學的黃得時（1909-1999），在哀逝漢文欄「最後一句」之外，更進一步提出未來「和文」中心的看法。把「漢文」的句點視為「和文」的開始，黃得時以積極的態度正面迎擊這個台灣文化政治的重要轉折。這固然和他身為接續徐坤泉擔任《新民報》學藝欄的編輯角色有關，不同的教養背景更是主導他們互異思考模式的主因。

徐坤泉（1907-1954）原籍澎湖，自幼移居高雄旗後，從小學習漢文，從廈門英華書院與香港拔萃書院畢業後擔任《新民報》學藝欄編輯。吳漫沙（1912-2005）出生福建晉江，1935年以華僑身份定居台灣，徐與吳都是《新民報》通俗漢文新聞小說的重要寫手。1932年《新民報》日刊化以後，在擔任

28 黃得時，〈日據時期台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21期（1985.12），頁60。江寶釵編，〈黃得時生平及著作年表簡編〉，江寶釵主編，《黃得時全集11》（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頁698。

29 「最後一頁」為吳漫沙自題剪貼簿資料之封面題字，引文為其內頁所署，後題「吳漫沙寫於1937.4.1在台北。」該剪貼簿收錄漢文廢止相關文章包括老徐〈最後一課〉、黃得時〈最後一句〉、李元奇〈最後六十天〉、施鳩堂〈最後一粒〉（詩），吳漫沙並未註名刊行日，但從文脈推斷，應是刊於1937年3月31日至6月30日之間，資料由吳瑩真提供。

學藝欄編輯的階段，徐坤泉的幾部新聞連載小說創下台灣文學史上「暢銷」與「長銷」的紀錄，最有名的則是以筆名「阿Q之弟」寫就的《可愛的仇人》，而吳漫沙則在徐坤泉引介下加入通俗小說的寫作行列。

這些漢文通俗小說一方面透過趣味、煽情的敘事手法爭取到新的讀者，同時也因為「去政治化」而閃躲了總督府的檢閱制度。但與過去標榜台灣人言論機關有所落差的傾向，也使得徐坤泉在編輯任內備受批判。徐坤泉卸任前夕，一場由「臺灣新文學社」主辦的座談會中，他被郭秋生如此質問著：

郭秋生：……現在新民報的學藝面、是你編的、你有滿足沒有？

徐坤泉：……沒有滿足。

郭秋生：……那麼有什麼新的打算沒有？像現在、做廣告欄的補白、豈不可憐？

徐坤泉：……無法、總是比和文的學藝欄還算差強人意（笑聲）。³⁰

郭秋生的質問點出《新民報》學藝欄的經營困境，也呈現該報日刊化後的走向爭議與內部路線問題。徐坤泉試圖延續《新民報》日刊初期的大眾文藝策略，即便在話題製造、作品的長銷與暢銷上創造佳績，但仍無法讓郭秋生者滿意。³¹ 徐坤泉「沒有滿足」的回答，顯示身為編輯的無奈與無力，來自文學同好的壓力，大概也是促使其交棒的內部因素。

接任者黃得時擁有不凡的家世與學歷，其父黃純青為知名漢詩人兼實業家、總督府評議員；這些文化與政治資本使他對於日文不停留在批判或拒斥層次，反而進一步地提出在「日常生活、不得不以和文為中心」這樣的務實主張。

黃得時的認識意味著那個固有的「漢文」界線勢必被打破，他必需重構一個可以吸納更多讀者大眾的舞台，而這舞台，在不久的未來將是日文。其認識

30 不著撰人，〈年頭放言的小集〉，《臺灣新文學》2卷2號（1937.01），頁74。

31 關於《新民報》日刊後的路線爭議可見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2期（2012.08），頁1-40。

反映了政治上的現實。前述小林總督提到的，領台已四十餘年，皇化普及，在基礎教育大規模推動的前提下，日語不再是異族的言語，日文閱讀也不僅止於知識階級的特權，通過日語述說日常生活成為可能，而它將接替漢文，成為另一種傳遞台灣人敘事的工具。

毫無疑問，這個認識促使黃得時接任《新民報》學藝欄編輯的重要位置，但面對前述帝國對於媒體統制的雙重壓力——積極透過同盟通信社「發送」新聞與消極透過協商「廢止」漢文欄，新手黃得時的初任時刻顯得欲振乏力。他因此在《新民報》學藝欄使用了大量同盟的供稿，這個便宜的守備之勢固然幫助他爭取到應變的寶貴時機，銜接了漢文作家輟筆的青黃不接時期，但連帶也招致許多惡評。

柳川浪花對於《新民報》的批評，就是典型的不平之鳴。在〈寂寥的昭和十二年的本島文藝界〉一文中，柳川指出：「最讓人失望的是《新民報》的文藝版。該報乃是自詡、同時亦為外界所承認的，本島人的意見領袖報紙。我們本以為該報會隨著文藝欄的新創，大幅開放版面，提供本島愛好文藝的人能夠活躍的舞台。然而從6月以來，刊登於該報的島內作品寥寥無幾，幾乎都用內地雜文敷衍了事。」³² 柳川浪花所謂內地雜文，指的即是同盟通信社的供稿，對此，黃得時日後回憶提到：

「同盟通信社」還供應「學藝欄」所需的稿件。這些稿件，是在東京總社編造的。其內容有文藝評論、散文、方塊、書評等，執筆者都是日本文壇第一流的作家。因此，把這些稿件刊登出來，確實可以增加報紙的光彩，提高報紙的身價，但是內容所寫的，卻是日本本土的事情，跟臺灣沒有甚麼關連，令人讀起來，難免有如隔靴搔癢，沒有切身的感覺。況且那些稿件，並不是只供應一家報社，凡是跟同盟通信社有合約的報

32 柳川浪花，〈淋しき昭和十二年の本島文藝界〉，《臺灣公論》3卷1號。柳川浪花的生平不詳，但從《臺灣公論》上幾則由其署名的記事推測，柳川可能是該報的記者。另外《臺灣公論》曾刊載一篇探討《高雄新報》臨時日刊問題的文章，署名「屏東 柳川浪花」。見〈臨時日刊とはこれ如何？〉，《臺灣公論》4卷2號（1939.02），頁10。

社，均可以獲得。所以彼此都是雷同，千篇一律，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但是本地稿件不夠的時候，用這種現成的同盟稿件，填填紙面，敷衍了事，卻也是很方便的。³³

黃得時不否認同盟稿件帶有便利性。在日文稿源一時短缺的台灣，名作家的文稿除了適時填補版面更為報紙學藝欄增添了可讀性。但在過度強調非營利與同一性的普遍訴求下，同盟的供稿也失卻了地方新聞必備的獨特性與時效性，所能引發讀者的迴響也受到限制。

媒體研究者林淇濱利用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cQuail）的「媒介霸權論」（hegemonic theory of media），提醒我們注意握有媒介權力的副刊編輯（守門人）如何經由策劃性編輯手段（滲透方式），將意識型態注入文學閱讀者的生活中，從而宰制文學附屬的文學階級、團體或個體。³⁴ 身為編輯的黃得時，自然有權力透過策劃性的編輯手法，賦予原本備受批評的新聞學藝版面嶄新風貌。當《新民報》學藝欄充斥同盟的內地供稿，招致批評聲不斷之際，黃得時遂運用編輯者的文化位置，於1939年7月起推出了「新銳中篇創作集」，欲以此突破重圍。

六、爭取日文讀者大眾：「新銳中篇創作集」與1930年代後期的大眾文學傾向

在黃得時（1909-1999）策劃下，翁鬧（1910-1940）、王昶雄（1915-2000）、龍瑛宗（1911-1999）、呂赫若（1914-1951）以及張文環（1909-1978）五位作家相繼在《新民報》學藝欄登場。他們在日本領台後15年左右誕生，1939年中篇小說特輯推出之際，最年長的編者黃得時和張文環是30歲，其他的人都還是20幾歲的少年。他們是完全在日本領台下成長受教的新世代，利用後天學習的殖民者語言作為吸取近代文明以及發聲的主要工具成為趨勢，這也意味著他們與前世代的漢文作家將走上不一樣的文學道路。滲透入日常生活

33 黃得時，〈日據時期台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文訊》21期，頁59。

34 林淇濱，《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37。

與思維的日本語文之運用成為其明顯標記，他們更進一步得以運用殖民者語言在中央文壇嶄露頭角。

編輯黃得時與作家們共同面對一群漸趨成形的日文讀者群。藤井省三的統計顯示，日本領台42年後的1937年，台灣人日語理解者率為37.8%，1940年到41年分別為51%及57%；其比率換算成人數，分別約為190萬、280萬及320萬。這個在1937年以後快速攀升的數字自然和報紙漢文欄廢止後的皇民化運動相關，與此對應的則是日益減縮的傳統書房以及漢文閱讀者數。³⁵

在日語理解者到達200多萬，也就是超過台灣人口半數的1940年前夕，這群新銳作家在黃得時的號召下，帶著他們的作品在日發行量達3萬3千多份的《新民報》學藝欄刊出。通過個人訂戶、公共圖書館、公私立的機構以及書店的流佈，很顯然其閱讀者數將不僅止於3萬多份。透過日刊報紙的生產、複製、消費與傳播，這些故事因此被傳遞著。

將五部日文中篇小說作為一種特輯，以連載的方式呈現，在台灣可以說是一種創舉。在此之前，西川滿首先於《臺灣日日新報》推出了前後多達144則「明信片隨筆集」專輯（はがき隨筆，1939.2.21-9.2）³⁶；繼之西川滿又推出「戰爭詩特輯」（1939.9.24-10.14）³⁷。利用專題形式創造話題，吸引《新民報》的跟進。「明信片隨筆集」推出不久，黃得時隨即在《新民報》策劃了「鄉土隨筆集」（1939.3.21-7.1）³⁸。跟透過來自學／官／產界的作者，訴求傳遞帝國知識的「明信片隨筆集」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鄉土隨筆集」試圖呈現的是台灣人視角下的地方經驗。這兩則例子展現《臺灣日日新報》學藝欄主編西川滿與《新民報》學藝欄主編黃得時的編輯策略與內在差異，但進一步

35 藤井省三《台灣文學この百年》（日本東京：東方書店，1998.05），頁31。安田敏朗在他的最新著作《かれらの国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11.12）亦利用臺灣總督府的統計資料整理出這分數據，他進一步提醒我們應將國語（日語）理解者稱為「國語教育體驗者」，才能更接近殖民地教育現場。

36 《臺灣日日新報》學藝欄主編西川滿推動的「明信片隨筆集」，共144則，執筆者以居住台北的總督府高級官員、台北帝國大學及台北高等學校的教授與雇員為中心，間以少數台灣知識人，內容雖標榜台灣相關的隨筆漫談，但透過「隨筆」的形式傳達帝國知識的意味非常濃厚。

37 「戰爭詩特集」為總共7篇的詩專輯，頗有接續「明信片隨筆集」的熱潮趁勝追擊的意味。

38 「鄉土隨筆集」，共22則，作者以台灣人為主。

為黃得時開展出超越西川滿的新局，則是「新銳中篇創作集」的策劃。

黃得時意識到，他所面對的讀者將不同於以往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特定的同人雜誌讀者群；亦不同於《新民報》日刊化初期，報紙漢文通俗連載小說的讀者群。這是一個受過日語基礎教育的青壯世代，數以萬計，看似隱形卻足以左右報紙最敏感的銷售量之全新讀者群。主編黃得時一方面要區隔舊有的漢文學藝欄的讀者大眾，一方面又要爭取他們的加入。在他策劃下，召集新知識分子寫作的「新銳中篇創作集」，就具備這樣的條件。

相較於強調個人抒情性的隨筆，小說的敘事性使作家必須著力於人物描繪與情節的經營。較之短篇，中篇小說則得進一步跨越作家的背景，擴大敘事軸線，朝向多角的說故事方式。也就是一個由自我到異己的書寫過程。經由他者的書寫與發現，促使作家必須跨越自我的背景與限制，重新爭取全新而未知的讀者群眾。這也使得新銳中篇因此註定成為一個「現在進行式」，一個含括大眾讀者的多音聲響，有各種發展可能的開放性故事。而這故事又搭配著精采的圖繪，由專業畫家執筆的插繪更為每天的「創作集」憑增許多趣味與風采。圖畫敘事與小說文本結合下的「圖文並茂」，讓我們聯想到前此漢文通俗小說的特性，一個符應大眾品味的新聞文藝生展消費／模式，使得文學不再高不可攀，也促成純文學作家朝向大眾讀者靠近。³⁹

翁鬧在〈有港口的街市〉跟我們談論一個發生在遙遠神戶的故事——一群關於海港孤兒與浪子／女的命運交響曲。王昶雄透過〈淡水河的漣漪〉描述了一則淡水河畔家族恩怨情愁史，這帶有鄉野傳奇色彩的敘事始終籠罩在濃烈的悲劇陰影下。以後設手法寫成〈趙夫人的戲畫〉，龍瑛宗試圖通過創新的寫作形式，解構寫實傳統，賦予通俗題材新生命。考量大眾讀者而設定內台愛戀故事為主軸的〈季節圖鑑〉，呂赫若在通俗手法的使用下，塑造出二元對立與刻意簡化的人物形象，創造出符應大眾品味的人物角色與誇大情節。⁴⁰ 長達

39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221期（2006.01），頁42-65。一文從啟蒙與通俗的辯證討論漢文新聞小說的現代性，可供參考。

40 〈季節圖鑑〉的分析見陳淑容，〈雅俗之間——呂赫若小說〈季節圖鑑〉試析〉，王惠珍主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清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6），頁259-275。

101回的小說〈山茶花〉，演繹了一場殖民地底下，關於啟蒙、成長與認同的青春之歌，在四個月的連載過程中，作者張文環更因為此篇成為街頭的超人氣者。⁴¹

這些文本看似沒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但隱晦的敘事手法卻又不約而同將故事帶往戰爭。〈有港口的街市〉乍看彷彿抽離時代脈絡，但隨著主角不斷進出於神戶、香港及大連等日本帝國「南進」、「北進」的重要港市，戰爭氣息因此呼之欲出。〈淡水河的漣漪〉以主角阿川前往大陸擔任志願軍夫為結局，其突兀的尾聲很難不讓人對於時局有所聯想。至於〈趙夫人的戲畫〉，則在結局時候創造了一個得以安頓主人翁彭章郎與冬蘭身心之處所——「南方」。「南方」是孤兒章郎與冬蘭逃亡以及希望之所在，也是戰爭時期充滿想像的地方空間。至於〈季節圖鑑〉則不得不讓人對於「內臺通婚」，此一戰時體制下重要國策產生聯想。而擅長說故事的張文環在小說〈山茶花〉中，透過一曲軍歌〈戰友〉的傳唱：「這兒離家幾百里，遙遠的滿州」，表達對戰爭悲運的無奈，這首歌隨即在不久後的太平洋戰爭時期被禁。

五篇並未設定主題，交由作家自由發揮的中篇創作，奇異地呈現了一個模糊卻彷彿觸手可及的戰爭背景。相較於（半）官方文稿的揚頌戰爭之作，這個將「戰爭」背景化的共通性，呈現台灣人集體的憂慮、焦慮與遭遇。正是因為在體現台灣作家的欲望與艱困的同時，也投射了讀者的想像於其中。這些背景化戰爭，圍繞著孤兒、愛情、成長與家的敘事，因此成為一種無形的肆應之道，藉由抒發台灣人的共同情感與意念，傳遞屬於「我們」的時代聲音。

七、小結

本文首先歷史性地考察1937-40年間，重探被黃得時喻為沒有文學活動也沒有文藝雜誌的本島文藝界之「空白時代」。指出1937年前後伴隨著同盟通信社的組織發展以及報紙漢文欄廢止，雖然使得原本活絡的台灣文學生態面臨前

41 〈山茶花〉是文學通俗化結合大眾消費文化的典型例子，《臺灣藝術》就提到小說連載風潮所及，有喫茶店因此而改名為「山茶花」。張文環，〈山茶花〉，《臺灣藝術》2號（1940.04），頁89。

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但危機也創造了轉機，促使日文報紙學藝欄的擴張。新聞編輯者開始有意識地運用報紙學藝欄這個新的文學場域，通過議題提出與專輯策劃，開創文學新契機，由黃得時推動的「新銳中篇創作集」即為其中代表。

「新銳中篇創作集」在刊出之後，獲得包括企劃者以及寫稿作家的肯定。1940年元旦《新民報》學藝欄刊載的三篇隨筆，包括黃得時〈台灣文壇的建設〉、張文環〈獨特的存在——今年也要奮鬥〉以及龍瑛宗〈一段回憶——文運再起〉不約而同地突出該特輯的重要性。

其中龍瑛宗在〈一段回憶——文運再起〉一文寫到：

接著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中篇創作集」。它是編輯黃得時的計畫，是最近少有的有意義的計畫。動員臺灣新銳作家的這個計畫，變成一個契機，強烈地暗示出文學運動再起之跡象。⁴²

新銳中篇之所以成功激起文運，除了推陳出新的行銷策劃手法，運用不同以往的說故事手法，吸引新的日文讀者大眾，更是重要關鍵。本文因此將「新銳中篇創作集」視為台灣作家由純文學走向通俗文學的嘗試，認為其反映《新民報》編輯黃得時與純文學作家們，共同爭取日文讀者大眾的策略。

我認為此一趨向與1930年代末期總督府的漢文抑制政策促成的日文讀者群之發展密不可分。本文因此試圖以另一種角度看待這個由漢文轉向日文的過程，認為殖民地漢／日文在對立關係之外，伴隨著殖民政策以及少數的單一語文理解者的轉換，它們的關係也隨之緊張或疏朗。

本文認為，台灣總督府的政治及教育措施，使得單一漢文／日文理解者成為少數的存在。重疊，共存的兩語或多語的使用者逐漸成為殖民地台灣的主流。1937年後，當原本固著的疊合關係被迫打斷後，日文作家改以接力的方式承接了漢文作家的寫作，繼續書寫「我們」的時代故事。他們因此修正對「大眾讀者」的定義及界線，試圖朝向通俗敘事。另一方面，當（被迫）噤聲的漢

42 龍瑛宗，〈ひとつの回憶——文運ふたゝび動く〉，《臺灣新民報》（1940.01.01），13版。

文在1937年逐漸失去文化政治舞台後，一群廣大的讀者也得要透過日文的閱讀，完成日常生活及其想像。透過黃得時策劃的「新銳中篇創作集」成功爭取到日文讀者，也使得一個新形態的日文讀者大眾於焉誕生。我們認為，通過該特輯的討論，有助於釐清1930年代末期台灣日文讀者大眾的形成狀況，也能更進一步理解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的內涵及其文化意義之轉化。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山本武利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四卷—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6.03）。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04）。
- 王惠珍主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6）。
- 同盟通信社編印，《同盟の組織と活動》（日本東京：同盟通信社，1941.07）。
- ，《同盟通信社の機構》（日本東京：同盟通信社，1941.11）。
- 安田敏朗，《かれらの国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11.12）。
-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編，《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06）。
- 江寶釵主編，《黃得時全集11》（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
- 林淇瀆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0）。
- 松浦恆雄、垂水千恵、廖炳惠、黃英哲等編，《越境するテキスト—東アジア文化・文学の新しい試み》（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08.08）。
- 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
- 春山明哲編，《台湾島内情報・本島人の動向》（日本東京：不二出版，1990.02）。
- 柳書琴、邱貴芬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04）。
- 狩野信行，《検証大東亜戦争史（上巻）》（日本東京：芙蓉書房，2005.06）。
- 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2004.04）。
-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日刊臺灣新民報創始初期電子書》（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07）。

- 陳培豐，《想像和界線：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
- 臺灣總督府，《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台北：臺灣總督府，1941）
-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日本東京：東方書店，1998.05）。
-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01）。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大村克人，〈新聞通信統制とその他〉，《新聞と社會》7卷7號（1936.07），頁14-15。
- 不著撰人，〈年頭放言的小集〉，《臺灣新文學》2卷2號（1937.01），頁74。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研究の問題点—台灣總督府による漢文禁止と日本統治末期の台灣語禁止を例して〉，《岐阜聖徳学園大学外国語学部中国語学科紀要》第5号（2002.03）。
- 松尾直太，〈《台灣日報》「學藝欄」及其主編岸東人〉，《台灣文學學報》8期（2006.06），頁63-96。
- 柳書琴，〈《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2期（2012.08），頁1-40。
- 張文環，〈山茶花〉，《臺灣藝術》2號（1940.04），頁89。
- 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2012.04），頁105-131。
- 陳培豐，〈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台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台灣史研究》18卷4期（2011.12），頁109-164。
-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221期（2006.01），頁42-65。
- 黃得時，〈日據時期台灣的報紙副刊——一個主編者的回憶錄〉，《文訊》21期（1985.12），頁58-64。

（二）學位論文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1940）〉（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三、報紙文章

不著撰人，〈漢文欄の廢止に就いて島内四日刊紙の申合〉，《臺灣日日新報》，1937.03.01，3版。

張文環，〈獨特なもの存在—今年は大いにやろう〉，《臺灣新民報》，1940.01.01，13版。

黃得時，〈冬眠を貪るな 臺灣の作家達よ〉，《臺灣新民報》，1938.01.01，11版。

——，〈臺灣文壇の建設〉，《臺灣新民報》，1940.01.01，13版。

龍瑛宗，〈文學の夜〉，《臺灣新民報》，1939.01.01，13版。

——，〈ひとつの回憶—文運ふたゝび動く〉，《臺灣新民報》，1940.01.01，13版。

